



谢国平 著

财富增长的试验

Pudong : A story of
economic prosperity

浦东样本



RISING
STARS
OF
THE EAST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财富增长的试验

Pudong : A story of
economic prosperity

RISING
STAR
OF
THE EAST 浦东样本
1990-2010

谢国平 著

上海
人民
出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财富增长的试验:浦东样本:1990~2010/谢国平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ISBN 978-7-208-09226-6

I. ①财… II. ①谢… III. ①地区经济—经济发展—研究—浦东新区—1990~2010 ②社会发展—研究—浦东新区—1990~2010 IV. ①F127.5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5002 号

责任编辑 杨柏伟
封面设计 王振宇
版面设计 熊俊

财富增长的试验:浦东样本(1990-2010)

谢国平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9.25 插页 2 字数 307,000

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9226-6/D·1711

定价 40.00 元

序

陈彦

2010年是一个特殊之年，一个值得我们记住的特殊之年，在我们满怀激情地迎来百年梦想——上海世博会即将实现的前夕，浦东开发开放迎来了她20周岁的生日。1990年4月18日启幕的浦东开发开放，20年来世人关注、全球瞩目，并吸引国内外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视角予以解读，剖析发生在这块改革开放热土上的神奇。

让历史告诉未来。这历史其实离我们不远，但却创造了奇迹。在浦东成陆的千年历史中，最近的20年是一个奇迹。回头来看，作为浦东开发开放的参与者，我们也常常在思考：千年时间里，虽经多次动荡和外来冲击，浦东却始终静静地躺在浦江之东，但在最近的这20年里，石破天惊地在世人面前崛起了。20年中，浦东经历了欧洲发达地区用两个世纪才完成的同样程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这真是一个谜。

在浦东的历史上，有关浦东发展的构想甚至思想的火花不断出现，但是为什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浦东能够出现爆发式的增长？为什么孙中山先生当年的宏伟理想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当一个并不发达的区域突然之间能够引来如此多的投资者，当“罗马一天而成”后，我们在惊叹这种奇迹之后，是应该静下来深入进行理性分析。以浦东开发开放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的大潮犹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从沿海到沿江，从东部到中西部，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全方位打开了，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挡地展开了。

正如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中所言，西方经济学界有“中国之谜”一说，而浦东则是一个解释“中国之谜”最适合的样本。浦东为什么能走向成功，又是怎样走向成功的？为纪念浦东开发开放20周年，中央党校、国防大学、上海

社会科学院等科研机构都在进行专题研究,深入解读“浦东模式”、“浦东精神”。看得出,本书作者谢国平同志也试图作出自己的解读。

这真是一个挑战。

值得高兴的是,谢国平同志作为一位长期工作在浦东的新闻工作者,是浦东开发开放的参与者、见证者、采访报道者。在浦东新区新闻战线上,他是一位既能深入基层采访,又能积极思考,而且十分注重工作积累的辛勤笔耕者,他务实的文风和凝练的文笔,在本书中都有一定的体现。本书不仅仅进行过程的记录和描述,并试图进行理性分析,浅显的语言道出了浦东开发开放 20 年的风雨历程。总的感觉是,全书视角比较开阔,能跳出浦东看浦东,并能尝试在全景式展示改革开放宏伟事业中凸显浦东地位,在全方位解读浦东经济社会发展中凸显浦东功能。在今天我们面临浦东第二次历史性跨越时,非常需要这种样本式的透析。

令人欣喜的是,本书还有较强的可读性。作者善于用比较流畅的语言,将碎片式的记忆有机地串联起来,犹如一幅历史画卷徐徐展开。书中既有一些历史性的宏大场面,也有过程中的细节刻画,有线性的叙述,有感性的描写,也有理性的分析。可以说这样具有个性化视角和语言特色的样本分析,是浦东新闻工作者的一次探索,也是新闻工作者对浦东开发开放 20 周年的真诚纪念。

是为序。

2010 年 3 月

(陈高宏同志系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倒逼 1

1. 天灾人祸,给新来的市长一份“见面礼” 2
2. 一边价格上涨,一边收入滑坡 6
3. 五个倒数第一,十个全国第一 8
4. 深圳杀开一条血路,上海怎么办? 13
5. 争论的结果:东进 20
6. 里程碑式的会议,向世界传递信息 25

第二章 梦想 33

1. 英国船长发现,那是一个伟大的地方 34
2. 从盐滩到棉田,沧海千年 37
3. 英国上尉的视野,外滩成为上海的骄傲 43
4. 繁荣送给浦西,落后留给浦东 49
5. 绝望后的构想:东方大港 53
6. 同乡会,推动浦东发展的先驱 58
7. 一亿元仅能买 20 斤茶叶 66

第三章 意志 73

1. 呼唤重振大上海雄风 74
2. 要把开放旗帜打出去,上海是一张王牌 77
3. 争论计划与市场,吴敬琏受到责难 79
4. “洋浦风波”让海南错过了机遇 82
5. 总设计师:浦东开发晚了 86
6. 这下,浦东有希望了 92
7. 像接龙游戏,全球产业大转移 97

8. 你们要抓住 20 世纪的尾巴 101

第四章 选择 105

1. 叫新区不叫特区 106
2. 东西联动,东西衔接,东西统筹,东西协调 111
3. 只有 3000 万元,其余自己想办法 118
4. 讨鱼,不如自己养鱼 124

第五章 政策 133

1. 克里姆林宫降下苏联国旗,一位老人开始南方之行 134
2. 北京多次宣布政策不会改变 144
3. 特区之特引来一场争论 147
4. 优惠政策转向功能性政策 150
5. 不给钱,不给项目,不给政策 154
6. 新特区有悖平等? 158
7. 争论就像一场春雪很快消失 161

第六章 政府 165

1. 探索“小政府大社会”,孤军深入 166
2. 有所为有所不为 173
3. 小政府逐渐变大了 179
4. 软政府,硬政府 183
5. 将行政审批进行到底 186
6. 草根组织总是长不大 189

第七章 社会 197

1. 移民浦东一波又一波 198
2. 城市化,大规模农民迁徙 203
3. 小小的联合国,探索国际化社区 207
4. 租界争论,邓小平再次为特区正名 210
5. 大量的社会人引发社区自治 215
6. 中产阶层兴起,社会转向“橄榄形” 217

第八章 文化 219

1. 内史第里,中西文化水乳交融 220
2. 习商习工,可惜没有走向大海那边 223
3. 办实业,倡新学,浦东学派身体力行 227
4. 向世界“借脑”规划浦东 229
5. “浦东汤”和“蚂蚁雄兵” 237
6. 站在第二线的白领文化 242
7. 抹去遗憾,浦东的黄金时代 244

第九章 难题 247

1. 强势,浦东带动了浦西 248
2. 增长因土地稀缺更加艰难 249
3. 辐射,离总设计师的构想还有差距 251
4. 园区,政府成功,市场并不成功 254
5. 产业,转移升级是难题 257
6. 以世界高度为标杆,后来居上 261
7. 超常规发展,追求更高层次的领先 263
8. 开放型经济还是外向型经济? 264
9. “重庆模式”的启示 266

第十章 博弈 271

1. 奇迹:经济增长还是制度变迁? 272
2. 多种模式,一枚棋子 276
3. 面对全局的局部试验 279
4. “北京共识”与浦东样本 284
5. 既要安全行驶,又要保证速度 290

后记 293

参考文献 295

第一章 倒逼

1. 天灾人祸，给新来的市长一份“见面礼”

1987 年底，朱镕基从北京来到上海。他是来当上海市市长的，但上海给他的一个见面礼却是一桩惨案。

那是 12 月 10 日，冬天的上海滩潮湿阴冷，寒风带着湿气浸过肌肤，穿透骨髓，让人打寒噤。清晨，上海的母亲河——黄浦江上起了大雾，整个江面上仿佛笼罩了一层厚厚的纱帐，远近灯光难辨，能见度在 30 米以内。一位叫徐康的市民骑着自行车来到位于黄浦江东边的陆家嘴轮渡线码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轮渡站内外人山人海，等待过江，而江面上已经听不到此起彼伏的汽笛声。

此时弥漫的大雾紧紧地将黄浦江封锁住，所有的船只都停航了。

随着上班高峰时间的到来，码头上等待去黄浦江对岸上班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很多人是在江对面的码头、港区和工厂工作。徐康就是在对面一家有着百年历史的工厂上班，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内心几乎和所有等待过江的人一样：焦急和烦躁。

在徐康的记忆中，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从大江东边西渡过江上班的居民越来越多。对他们来说，过江唯一的通道就是坐船摆渡。那时，陆家嘴轮渡线是黄浦江下游 14 条航线中规模最大的，1990 年日均客流量达 18.3 万人次，节假日则高达 24 万人次之多。

每天早晨人流如潮水般涌向浦西，傍晚再回流浦东，渡口狭窄的通道里人们黑压压地挤进挤出。在过江人中有这样的说法：天天摆渡过江不怕风吹雨打，就怕有雾停航。那时在守纪律的上海市民，尤其在产业工人中，上班迟到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但是这一天，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直到上午 9 时，太阳才开始露脸，浓雾渐渐散去，轮渡有望开航，这时在陆家嘴轮渡码头已聚集了 3—4 万渡江心切、赶着上班的摆渡人。

9 时 10 分，当第二班轮渡船开航时，人们已经等不及了。大量的人拥挤

着往船上赶，秩序开始混乱，而偏偏人群中又混杂着各种自行车一起向船上涌去。徐康也推着自行车拼命地挤进人流。你挤我挤，人难走，自行车更难走。突然，一个中年男子连同他的自行车一起被汹涌的人流挤倒，紧接着2个、3个、4个人被挤倒……倒下的人挣扎着要爬起来，但向前拥挤的人群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推着，发疯似地踩着那些倒地的人冲向前方，此时，前面轮渡的闸门已经关上，但后面的人还在向前冲去。一起惨祸就这样酿成了。

16人死亡，30人重伤，近百人被挤伤。陆家嘴轮渡线惨案震惊中外。

回忆那场景，二十多年后，徐康依然觉得就如发生在昨天：那天他前面一辆自行车倒下了，他也跟着被绊倒了，但后面的人潮水般往前拥，人们已无法控制自己的脚步，有的在他身边倒下，有的从他身上踩了过去，有的压在他身上。后来他什么也不知道，醒来已经躺在医院里了，回忆起来，他依然连连叹息：“逃难一样，惨了不得了。”^①

当时的上海人都知道，如果没有什么大的意外，已被中央任命为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朱镕基将在第二年春季召开的上海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接替江泽民任上海市市长一职，成为中国最大工商业城市的当家人。来上海之前，他是国家经委副主任。

此时朱镕基的名字仅列入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名单，年纪却已经接近60岁了，即使任职一届上海市长，5年下来，65岁，正好是中央规定的省部级干部退休的年龄。因此按一般的看法，这已是朱镕基跌宕人生的顶峰了。

从现在看来，朱镕基从1987年到1991年在上海任职不到四年，前两年可谓多灾多难。而那两年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非常困难的两年。真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增益其所不能。

朱镕基有着湖南人的倔强性格。他幼年与母亲相依为命，10岁时，母亲就离他而去，朱镕基被三伯父朱学方收养，加上当时兵荒马乱的时代背景使得朱镕基少年早熟、发奋努力。

或许正是由于幼年的苦难经历，加上此后求学的颠沛流离，使朱镕基更加同情弱者贫者，仇视为富不仁，痛恨贪官墨吏。后来出任国务院总理，他在记者招待会上放出豪言，“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

^① 《陆家嘴轮渡今晨发生惨祸》，《新民晚报》1987年12月10日。

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观看电视直播的观众感动不已，一时广为传诵。

从当时看，陆家嘴轮渡线惨案似乎是一起偶然事件，但从历史角度看，这样的惨案迟早要发生。宽阔的黄浦江硬生生切开了上海城区，然后平静地奔向大海。于是，每天大量的人流只能使用着最古老的方式——通过摆渡船往返黄浦江两岸。多少年一直有人做着建设一座大桥的梦想，但因为浦东和浦西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落差，两岸的交通建设就没有被真正放到当地政府的议事桌面上。即便是“文化大革命”开建、用了六年时间建成的打浦路越江隧道，在那个特殊年代也并非完全是为了解决浦东和浦西的交通问题。那时有一文规定，凡是要通过这条上海唯一隧道到对岸的汽车，司机必须带上单位的介绍信。这种黑色幽默的事在当时却是非常认真地执行着。

没有桥，唯一的隧道又不能解决交通问题，这是上海多年来的一个痛。陆家嘴轮渡线惨案让人们长叹之余惦念着黄浦江过江之艰难，或许这就是朱镕基日后力排众议坚持要在黄浦江上造大桥的原因之一？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在那时“过江难”已经深深地印入了上海市民的脑海中，成为难以抹去的阴影。

陆家嘴轮渡线惨案刚刚消停，又一起天灾袭来。第二年春节前后，甲肝病毒突然席卷大上海。

1988年1月中旬，上海开始出现甲肝流行，患者数量急剧上升，到了2月1日，日发病量高达19013例。从1月30日至2月14日，每天发病人数均超过10000例。

各家医院涌进了大量病人，症状为发热、呕吐、乏力，还有人脸色发黄。很多人天不亮就到医院排队挂号，还有的自带折叠床、被子，来到医院要求住院，生怕传染家人。

起先虽已知是甲型肝炎，但却无法确定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来势汹汹的甲型肝炎的爆发。大多数患者SGPT在1000单位以上，90%以上的病人出现黄疸，85%以上的病人抗HA试验呈阳性。最终，卫生防疫部门确定是由毛蚶携带的甲型肝炎病毒所致。^①

^① 《大浪淘沙——何公心新闻作品选》，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

据统计,至当年5月13日,共有310746人发病,31人直接死于此病。在持续了半年多的甲肝风波中,全市有230万人吃了毛蚶,35万人得甲肝,按照医学上的规律,没有进入临床,但身上携带了甲肝病毒的患者是其四倍,这意味着当时上海有150万人携带了甲肝病毒。

1988年的时候,上海的人口不过1200万。全市医院甲肝门急诊共360万次以上。上海各家医院,包括肝炎等传染病房,以及所有的内外科病房,总共也就5.5万张病床,根本不够用。于是,仓库、厂房、教室等都被用来做病房。医护人员也奇缺,有的病人发烧39度也没有人来端杯水。

甲肝爆发已经影响到了这个大城市的运转:生产一线减员十分之一;上海销售出去的副食品,纷纷被退回来。那时,就连上海去北京的火车也是空空荡荡的。因甲肝而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超过百亿元!①

到了1988年的3月底,天灾终于得到控制,全市运转趋向正常。

这次甲肝疫情的爆发考验了上海市政府的执政能力,也暴露出上海在城市公共建设方面的严重不足,以及公共医疗设施和体系的落后,这让郁闷中的上海人更加强烈地寄希望于新的市长,期望新市长能够带领上海人民走出困境,因为上海市民记住了新市长选举演讲时的承诺。

那是1988年4月24日上午,上海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上海展览馆举行,场内座无虚席,那一天将选举上海市市长和副市长。尤其对新市长,人们抱着极大的期望。

在众多人大代表的印象中,朱镕基是个瘦削又带些冷峻、不苟言笑的人。此前的一次小组讨论会上,曾有人大代表当场提出要求,请朱镕基作一个自我介绍。朱镕基坦诚地讲述了坎坷身世,在场的代表们心生敬意。

选举前,主持人宣布,每个候选人演讲的时间只有15分钟。

作为市长候选人的朱镕基最后一个上台。一脸严肃的他西服领带,一上来就幽默地说:“我是‘丑媳妇怕见公婆’,可这个丑媳妇迟早要出来见人的嘛。”一开场就引起全场的笑声和掌声。

“新的一届市政府应该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效率的、廉洁的政府!”此话立刻打动了代表们,鼓起了掌。

① 谢丽娟:《我经历的1988甲肝风暴》,曹景行主编:《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

“现在，上海的经济困难还没有走到谷底，要有这种危机感，从而激发起奋发图强的精神，树立起必胜的信念！”掌声又一次打断了朱镕基的发言。

眼看 15 分钟到了，朱镕基转过身问，“主持人，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还没等主持人回答，代表们掌声再起，有的代表激动得眼睛湿润了。困境中的上海太需要这样的大声疾呼了。

朱镕基的这次演说持续了整整 110 分钟。朱镕基的发言如同一把火，点燃了在场代表振兴上海的信心。事后，有细心的记者统计，会场上共响起了三十余次掌声。无疑，代表们已经将振兴上海的希望寄托在这位新市长的身上。

朱镕基率真的个性和袒露胸怀的语言风格，为百姓所称道。当天下午，大会执行主席吴邦国宣布选举结果，朱镕基正式当选上海市的第七任市长。^①

2. 一边价格上涨，一边收入滑坡

那年头的上海市市长真不好当。真是天时不济。

摆在朱镕基面前的是一连串让人尴尬的数字：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从 1949 年到 1979 年的 30 年间，物价年平均上涨率只有 1.3%。而到了 80 年代后期实行双轨制后，大量的原材料价格上涨，然而上海产品的生产、销售、定价还是被计划之手牢牢控制住。计划定价，一件棉毛衫的利润只有 2 分钱，企业还有什么活路？

中国问题学者何博传在他的《山坳上的中国：问题·困境·痛苦的选择》一书中曾说过这样一个例子：上海人到深圳去买折叠伞，结果发现是从上海出口香港，然后转销到深圳的。上海人很高兴，说比在上海买便宜几块钱，而深圳人也高兴，说赚了几块钱，香港公司也高兴，也说赚了几块钱。经济学家对这样的现象也摇头看不懂！

那一年正是中国领导人欲闯价格改革关的年头。1988 年 5 月 19 日，邓小平在外事接待中表示，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

^① 《共和国总理朱镕基》，《南方周末》2003 年 3 月 8 日。

“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邓小平说。^①

1988年5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发行面额为100元和50元的人民币。

接着，8月17日，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决定，放开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变长痛为短痛，闯物价改革关。一时物价大涨，抢购风遍及南北，火柴、肥皂、毛巾、皮夹克、羊毛毯、洗衣机、录音机，乃至金饰品，见什么抢什么。那一年，物价比上年上涨18.5%。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流通发达，市场供应算是稳定的，但此时在计划管制突破前夕，变得那么不正常了，市民人心不稳。

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也发表记者的文章，直言上海：一边是几千种商品价格上涨，一边是地方财政收入的连年滑坡。

让上海人更加失落的是在整个20世纪，上海综合经济实力一直领跑全中国。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30年中，上海始终是中国的工业和财政支柱，居共和国经济长子之位。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经济发展开始陷入困境。10年间，上海的经济增长速度在14个沿海城市中最落后，GDP增长速度是7%，比当时全国平均的8.9%还逊色1.9%。

这一时期，上海还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产业结构以国有企业为主。在1979年从安徽凤阳小岗村掀起并席卷全中国的农村改革并未使上海直接受益，而城市改革，上海又比中国的其他城市晚了5年。承包、租赁及用工制度等改革已在重庆、武汉、沈阳、广东抢得先机，上海却没有动作。上海就像一张黑白照片，凝滞在20世纪50年代，毫无生机。

美国著名的咨询智囊库——兰德公司的专家说，中国的经济中心已出现南移的趋势，广东将取代上海。

但是，这位“长子”仍在为全国供血。1985年前，中央政府对上海的财政基本上是属于“统收统支”，用曾担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的话说：“上海是中央财政。”上海当年的利税收入上缴中央，上海要用钱再向中央申请。毕竟上海是中央政府的重要财源：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末，上海共上缴国家财政收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人近4000亿元，占全国总收入的六分之一。^①

因此，上海的一位滑稽演员周立波曾经在舞台上为上海人正名：东北人讲上海人小气，当年只有你们上海才有半两粮票。周立波反驳：上海人把一斤粮食的九两半都交给了国家，自己留半两，谁说上海人小气？

曾在1981年至1985年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后来曾遗憾地说过这样的话：“在我当上海市长的期间，我上对得起朝廷（喻中央政府），每年上海上缴国家财政占国家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但下对不起黎民百姓（喻上海市民）。每天早晨我看到马路上有那么多多的煤球炉在生火，到处是烟雾腾腾，那么多马桶在马路上刷洗，我真感心痛，上海实在没有多余的资金来改善和发展市民的生活了。”^②

也因为一直心存这种内疚，汪道涵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起就筹划要开辟一个上海新区，以解决上海在城市发展中的困难。

而到了1988年底，中国出现了双轨制，计划和市场不断地博弈着，引发了许多奇特的现象。朱镕基是从国家经委来到上海的，到任后他发现自己手中没有钱，没有物。上海是一个工业城市，没有矿产，原生产需要的原材料是由国家统一计划调拨，但是双轨制后上海只好拿桑塔纳、彩电冰箱去和兄弟省市换原材料，甚至连猪肉都要换，市府开会时还要通报猪肉库存数。

称朱镕基为经济专家并不过分，他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时，兼任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朱镕基曾是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导师，这一头衔并非虚戴，他带过四个技术经济的博士生。但是上海的经济状况也给他出了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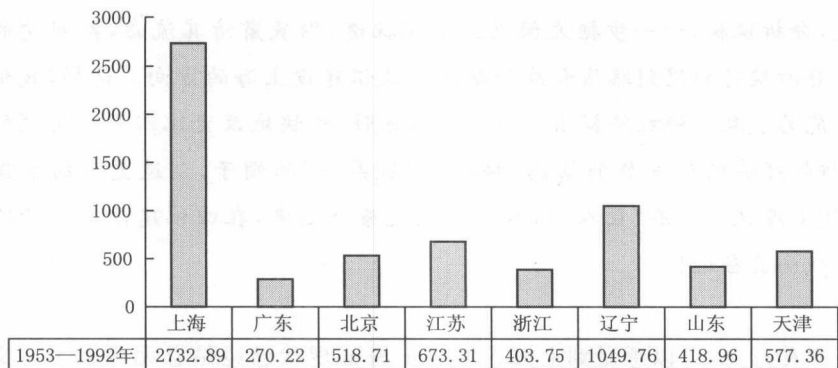
3. 五个倒数第一，十个全国第一

民间谋求上海出路的呼声不断。

1980年10月3日的《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沈峻坡的文章《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关于上海发展方向的探讨》。报纸还加了编者按。

① 《上海财政税务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财政税务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

② 上海交通大学编：《怀念汪道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单位：亿元

新中国成立后，上缴中央财政前8名地区

资料来源：《中国财政年鉴》，江苏、湖南省财政厅以及各省市年度统计公报网站。

编者按：根据四化的要求，我们应当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上海？这是全市人民普遍关切、议论颇多的一个重大问题。要找到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首先要对上海的历史和现状作一番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探讨，从中引出经验和教训。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沈峻坡同志的文章，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材料和见解。现将此文发表，以期引起讨论。

长期来，上海一直存在着一种极不正常的矛盾现象：一方面，生产建设上一马当先，名列前茅，有不少个全国第一；另一方面，城市建设上却“老牛拖车”，十分落后，有若干个全国倒数第一。为什么“最佳”和“最差”两种截然相反的状态可以在一个大城市里并行不悖地同时存在？为什么“骨头”和“肉”的比例失调情况如此严重？为什么生产和生活的矛盾如此尖锐？原因当然是很多的，但大量的事实表明，根本原因在于左倾思想对经济领域的长期干扰和破坏。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人们无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置客观经济规律于不顾，盲目地信奉什么“干劲无穷尽，上游无止境，多快好省没有底”，一味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高速度、高积累，无休止地拼设备，无限制地挖“潜力”；其结果必然是竭泽而渔，杀鸡取蛋，把上海变成了一个生产高度发展、生活矛盾重重的“畸形儿”。这种由左倾思想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应当成为我们永远牢记的历史教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希望全市各条战线特别是经济战线上的同志，都来就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充分发表意见。在讨论中，要联系实际，回顾